

撤土：生育何以从共同事业沦为私人自理的冒险

摘要

ABSTRACT

本文提出并论证一个新概念——撤土——以解释当代年轻女性集体性生育退出背后的深层机制。“撤土”指的是一套尚未被精确命名的结构过程：社会将曾由家庭、邻里、单位共同背负的照护与再生产责任，在多层制度变革中逐项卸除，将全部成本与风险压回到作为生育直接承担者的女性个体身上，而在兜底被撤空之后，公共补位迟迟未能及时填进那片空白，使个体被滞留在一片没有兜底的地表上。本文通过追溯撤土如何在三股矛盾——照护劳动嵌入生产组织与市场化效率要求之间的矛盾、代际共居作为默认照护配置与居住商品化之间的矛盾、劳动力市场的“理想员工”预设与照护责任的不可消除之间的矛盾——的交替推进与叠加结算中被逼出来，论证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引入一个跨越三代女性的具体案例，展示撤土的发生学逻辑如何在个体生命中被时间性地经验到。本文进一步将撤土置于与“国家撤退”和“照护危机／社会再生产”这两组强势既有理论的正面交锋之中，划清其不可通约的辨别面。最后指出，回应当代生育退出的实践方向，不在于道德上召唤“责任”回归，而在于启动一场“再植土”的反向运动——让照护与再生产重新成为被社会共同承担、共同兜底的公共事业，并在制度设计上牢牢守住不与旧日父权兜底共享同一套性别预设的底线。

关键词：撤土 生育退出 结构性卸载 兜底 照护公共化 国家撤退 照护危机

一、引言：一片失去了名字的地表

在关于“为什么年轻女性不生孩子”的漫长讨论中，有一种经验反复出现，却迟迟没有被给予一个精确的名字。一个三十岁的女性，在深夜与已婚已育的闺蜜长谈之后，在社交平台上读到了一位陌生母亲产后抑郁的自述之后，在饭桌上听到母亲无意间提起“当年为了带你，我放弃了那次调动”之后——她对生育的判断发生了某种位移。这种位移不是“不想生”那么简单。她可能仍然喜欢孩子，仍然渴望亲密，仍然想象过为人母的画面。但她同时做出了一个判断：这件事，目前的我做不了。不是“不愿意”，是“做不了”。

这个“做不了”的判断，正是本文试图命名的经验的入口。它不能被还原为经济学的成本核算（“养不起”），不能被还原为心理学的动机分析（“不够想要”），也不能被还原为文化批判意义上的“觉醒”或“自私”。它是一笔在特定结构性条件下做出的存在判断：生育这件事，在目前这个版本的社会安排中，不被任何人接住。它被完全地、不加缓冲地压在了一个人的肩上。而这个人，基于对自身承受限度的诚实认知，判断自己扛不住。

这个判断之所以迟迟未被精确命名，是因为既有的话语工具箱里找不到一个能装下它的概念。“生育成本太高”说的是经济账，但那个女性说的不是钱——她说的是“我一个人”。“支持系统不足”说的是制度缺口，但那个女性说的不是政策——她说的是“没有人”。这些既有概念捕捉到了现象的表层，却漏掉了经验中最要害的那个质地：曾经有一片土壤，让生育这件事得以被众人共同承担。这片土壤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历了一场沉默的撤离。而撤离之后露出的，是一片坚硬的地表，生育在这片地表上变成了一桩只能由个体独自面对的孤绝行动。

这片土壤的撤离，就是本文要命名的核心概念：撤土。[¹]

“撤土”不是一个修辞，而是一个具有精确内涵的发生学概念。“土”在这里指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土地，而是使生育得以被社会性地承担、分担、兜底的那整套制度、网络、规范与共识的复合体——它的关键质地不在于“服务”的质量或效率，而在于它的存在形态：嵌入日常、冗余兜底、默认可用、非契约性。这四个属性将在下文的追溯过程中逐步浮现，在此只需先把握其最要害的一点——有土，生育是一桩被众人托举的共同事业；没土，生育是一桩被砸在个体身上的私人冒险。

“撤土”指的，就是这片地基在特定历史-制度条件下被逐步拆除的过程。它不是某一项政策的后果，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变动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内叠加推进，共同制造了一个方向明确的位移：把曾经由社会

整体承担的成本，一步一步地卸到个体女性肩上。而在此过程中，公共照护的制度供给长期滞后于需求的增长，未能及时填补兜底撤空后留下的空白，使个体被迫裸露在那片被撤空了兜底的地表上。

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当代年轻女性对生育的集体性退出，在深层意义上是对撤土这一结构过程的理性回应。退出不是“不想生”，而是在兜底被系统性撤除后，生育已从一项可以被合理承担的生命旅程蜕变为一桩不可承受的孤绝冒险。退出，是在肉身进入这场冒险之前，凭借代际经验与同辈叙事的预警，做出的清醒预判：我不扛。

这个判断一旦被明确提出，本文追问的就不再是“她们为什么不生”或“社会怎样才能让她们愿意生”，而是三件事：那片曾经让生育可以被承担的土，具体是怎么被撤走的？撤走之后，暴露出了什么？而如果要回应这场退出，需要启动的是一场什么样的反向运动？

本文行文遵循这样的节奏：第二节将撤土与两组最强有力的既有理论——国家撤退与照护危机——进行正面交锋，以划清这一概念的不可通约边界；第三节将展开撤土的发生学追溯，看它如何从“旧兜底与市场化效率要求的矛盾”出发，通过矛盾的两次结算和最终的锁死，逐步逼出母亲独扛的处境；第四节引入一个跨越三代女性的具体案例，展示撤土在个体生命中的时间性经验；第五节分析撤土同步完成的隐蔽意识形态操作——将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封存起来、并让生育从结构保障退化为个体偶然；第六节回应若干潜在反驳；第七节指明再植土的方向性道路；第八节收束全文并交代判断的证伪条件。

二、撤土在与既有理论的正面交锋中站住

在进入撤土的发生学追溯之前，必须先将这个概念置于与两组最强既有理论的正面交锋之中，以证明它切开的辨别面不可能被任何一种现成的分析框架所覆盖。两组理论分别是：福利体制比较与社会政策研究中的“国家撤退”论述，以及跨国女性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中的“照护危机／社会再生产”批判。这两组理论在经验表层上与撤土高度重叠，在学术话语中合起来几乎覆盖了当前对生育退出问题的全部结构性解释。如果撤土不能在与它们的正面较量中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一）与“国家撤退”的逐项交锋

“国家撤退”（state withdrawal / retreat of the state）在福利体制比较和经济社会学中有一套相当成熟的讨论。其核心分析单元是国家／市场／家庭三者之间的责任转移：国家从公共服务供给中后撤，将照护、教育、养老等责任转嫁给市场或家庭，导致福利供给的商品化与家庭的再负担。这一分析框架的底层是一个溯源逻辑——追问“谁该管的事没人管了”，识别责任的制度归属及其转移轨迹。

撤土与“国家撤退”在经验层面确实有重叠。单位托育的关停涉及国家从公共照护供给中的后撤，公共托育体系的长期供给不足也可以被纳入国家撤退的解释范围。但两者在分析底座上有根本差异：国家撤退的分析单元是责任的制度归属，它擅长捕捉“公共部门不再管了”这一维度的变化；撤土的分析单元是兜底的土壤质地，它捕捉的是“这件事从被冗余的人分担变成了只能自己想办法”这一维度的变化。

这两层差异在生育退出问题上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结论。国家撤退会告诉一位年轻女性：你之所以觉得扛不住，是因为国家在照护公共服务上投入不够，公共托育没覆盖到你。这当然是对的。但它不会告诉你另一件事：即便公共托育有一天覆盖到了你，你仍然是一个人在扛——因为公共托育所替代的只是单位保育员或市场化保姆的那双手，它替代不了祖母在院子里一边择菜一边看着孩子的那种日常存在，替代不了邻居顺手把孩子接回家写作业的那种非契约性的相互接应，替代不了当你深夜崩溃时，有一个不需要付费、不需要预约、不需要资格审查的人出现在你门口的那种冗余兜底。这些不是“公共服务”，不是“国家责任”，它们在范畴上不属于国家撤退所分析的那个对象域。但它们正是被女性在描述“做不了”时反复提及的那种经验质地——是“没有人了”，而不是“没有制度了”。

这就是撤土与国家撤退之间那道不可通约的边界。国家撤退问的是：谁该兜底？撤土问的是：还有没有人兜底？前者关心责任的制度归属，后者关心存在的兜底质地。两者各自独立，却又在经验上相互缠绕。一个女性可以同时被两者击中：国家的公共服务在她所在地没有覆盖（国家撤退），而她的母亲也不住在隔壁、邻居

也互不相识（撒土）。两种缺失共同制造了她的独扛处境。但如果只用“国家撤退”来命名她的处境，你会错过后半——而那后半，恰恰是她在代际对照中感知最锐利的那部分：“我妈当年还有单位托儿所和隔壁姥姥，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撒土并不否认国家撤退的解释力。它要说的是：国家撤退解释不了的那层经验——“不止是制度退了，是人也退了”——需要另一个概念来装。而这个概念，就是撒土。

（二）与“照护危机／社会再生产”的正面对话

如果国家撤退是撒土在制度分析维度上最该正面交锋的对手，那么“照护危机”（crisis of care）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跨国女性主义讨论——特别是Nancy Fraser关于照护的边界斗争的论述、Silvia Federici关于再生产劳动的被剥夺的分析、以及东亚福利体制研究中关于“家庭主义照护体制瓦解”的文献——就是撒土在政治经济学维度上最强有力的对话者。这组理论的核心追问是：再生产劳动——养育下一代、照护老幼病残、维持家庭日常运转——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中如何被系统性低估、外部化、转嫁？它的分析底座是资本与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需要再生产劳动来维持劳动力的持续供给，但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又不断挤压、侵蚀、剥离再生产劳动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最终制造出照护的全面危机。

这组理论与撒土在经验表层高度重叠。两者都看到了照护负担向私人领域、向妇女身上的转嫁，都看到了这种转嫁在近几十年中的加剧，都看到了一种“社会整体不再共同承担照护”的危机。但两者的分析底座从根本上不同：照护危机的分析底座是资本主义，它追问的是再生产劳动如何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变得不值钱、不被承认、却不可或缺；撒土的分析底座是兜底的撤退与个体的滞留，它追问的是那些曾经共同负担照护的人——单位保育员、祖母、邻居——怎么一个接一个地从母亲的身边消失，连同他们构成的那个冗余网络一起被撤空。

这两层追问的差别，落在具体经验上可以看得更清楚。照护危机的分析会告诉你：照护劳动不值钱，是因为它不在市场上交换，它的价值在资本核算中被系统性地消除，所以做照护的人（主要是女性）被锁定为“不产生价值的人”。这个分析揭示了照护劳动在价值体系中的结构性贬低。但它不回答另一件事：为什么今天做照护的人不仅不值钱，而且孤立——为什么她身边曾经存在的那些分担者都不见了？不是因为资本把他们剥削跑了，而是因为制度变革（单位制解体、住房商品化、劳动力市场重组）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以完全不同的节奏，把那些分担者的存在条件一项一项铲平了。照护危机的解释只能走到“照护被资本贬低”这一步，它走不到“照护被制度铲平”这一步——因为它没有处理兜底维度。撒土的独立贡献，就在于补上了这一步。

进一步说，两者的敌人也不同。照护危机的敌人是资本的积累逻辑——它要把照护从无偿劳动中解放出来，通过公共化、去商品化、社会工资等方式对抗资本对再生产的侵蚀。撒土的敌人不是资本，是撤退与补位之间的时间裂缝——在兜底被撤除之后、公共补位迟迟不来之间的那段漫长滞留期。在这段裂缝里，母亲不是被资本剥削，而是被遗忘。剥削预设了一个剥削者，遗忘甚至没有一个施动者——它就那样发生了，没有人专门决定要遗忘她，制度各自优化自己的效率，文化各自更新自己的叙事，等一切落定，已经没有一只手还留在她肩膀上。撒土追问的正是这片遗忘的结构性机理。

两者当然可以各自为战地站在自己的分析底座上，但在经验层面也需要相互补充：照护危机解释了照护为什么不值钱，撒土解释了做照护的人为什么被丢下。值钱的问题可以用补贴、社会工资、公共化来回应，被丢下的问题需要的不是钱，是把那些手重新接回来的制度安排——而这里恰恰是撒土与再植土的规范性诉求所在。两笔追问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结构性判断。

基于以上两场正面交锋，本文声称：撒土是一个不可还原为既有理论的应用或变体的独立概念。它不取代国家撤退或照护危机的分析，但它切开了这两者都切不开的那一层——兜底作为一类特定的存在质地，有一条独立的制度生命轨迹：它曾经存在，它被一项一项撤除，它的消失不能被归结为“资本贬值”或“国家不管”。撒土的名字，就是这片曾经被社会共同承担的地基的撤离。而那片地基的名字，叫作土。

三、撤土的发生学：从矛盾中逼出来的独扛处境

撤土不是一项政策、不是一年之间发生的事。它是在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转型中，经由三股矛盾的交替推进与叠加结算，逐步将母亲逼入一种无人分担的处境的。当一位女性在今天做出“我一个人扛不住”的判断时，她面对的不是其中某一笔矛盾的后果，而是三股矛盾全部结算完毕、相互锁定之后的整片坚硬地表。

以下是撤土的发生学展开——不是“撤土的原因是什么”的因果追溯，而是“撤土如何从三股矛盾中被一步一步逼出来”的结算过程展示。

（一）第一笔矛盾：照护嵌入生产 vs. 市场化效率要求

撤土的第一推动力，来自一场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矛盾：照护劳动曾被深深嵌入在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单位）的内部，作为职工福利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被提供；而国有企业改革与市场化转型要求企业卸下一切“社会包袱”，将效率作为唯一目标。

这笔矛盾的内在结构是这样的：照护嵌入生产，意味着托儿所就在厂区内部或附近，母亲上班时接送孩子不需要额外的时间成本，孩子白天有固定的地方可去，有事时母亲能迅速赶到。这不是高质量的服务——旧日单位托育在设施、师资、教育理念上可能远不如后来的市场化幼儿园——但它具有一种以“嵌入”和“默认可用”为核心特征的存在形态。市场化改革则要求企业将全部资源集中到生产经营上，托儿所、幼儿园被视作“非经营性资产”，应当剥离、关闭或转制。

矛盾在这一轮结算的是第一笔：照护被从生产组织中卸出来，抛向了家庭与市场。企业账本上那笔照护成本被清零了，效率提升了，改革的目标达成了。但结算之后产生了一笔新矛盾：被卸出来的照护工作量没有消失——孩子仍然需要被看护——它只是从“企业提供的公共福利”变成了一桩需要由母亲自己去安排或购买的私人事务。旧兜底撤掉了第一步，而替代性的公共制度安排尚未成形。

这一笔矛盾结算的后果对于不同群体是不均质的。对于能够购买市场化托育服务的家庭而言，旧兜底的撤除可以被商品替代，质地上虽有损耗（商品没有冗余性，你付不起它就停），但功能可以勉强延续。对于无力购买的家庭，空隙是自己填补的。沈阳市某大型国有机械厂的档案资料和职工回忆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该厂于一九九六年关闭了厂办托儿所，在册女职工二千三百余人，托儿所接收的幼儿不足百名——从效率角度看，关停是“合理优化”。但托儿所关停之后，女职工们要么把未到入园年龄的孩子独自锁在家中，要么请病假、事假填补空白，或由已经退休的婆婆临时帮忙。[2] 婆婆的介入——看起来是“有替代方案”——本身就是下一笔矛盾的伏笔：这种代际互助之所以能够成立，依赖的是一种当时仍然维持着的居住邻近性，这种邻近性很快将在下一轮矛盾的结算中被大面积冲散。

（二）第二笔矛盾：代际共居作为默认照护配置 vs. 住房商品化

第一笔矛盾的结算把照护从企业中卸出来。被卸出来的那部分照护，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祖辈——尤其是祖母——在日常生活的邻近性中悄悄接住的。但住房商品化的浪潮几乎在同一时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制造了第二笔矛盾。

这笔矛盾的内在结构是：从九十年代末开始的住房制度改革将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从单位分配住房推向了商品房市场。在旧模式下，三代同堂或同一单位大院内就近居住是多数家庭的默认配置。这种空间安排使得祖母可以一边在院子里择菜一边看着孩子，放学时顺手接回家——这不是一次专门安排的活动，而是一种嵌入在日常生活节奏中的默认存在。住房商品化将“独立购房、核心家庭独居”推举为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配置。这一变化在文化叙事中被表述为“生活品质的提高”——它意味着隐私、自主、不受长辈干涉的夫妻生活。但它在照护维度上制造了一个当时未被充分核算的后果：原先那些嵌入日常的、不依赖主动调动的人际照护节点，连同孕育它们的居住空间安排一起，被房子给隔开了。祖母不再住在隔壁院子里，她变成了一位需要提前约好、跨越半座甚至一整座城市才能来访的“客人”。

这第二笔矛盾的结算结果是：代际照护从“默认可用”变为了“需要调动”。它还在，但它的存在质地发生了质变——从嵌入在日常起居节奏中的自然存在，变成了一项需要专门组织、有限时长、附带人际成本的“帮忙”。调动能力的分布是不平等的：父母身体好、关系好、离得近、自己有足够住房空间的家庭可以调动得起，反之则调动不起。旧日在每一位母亲身边不依赖于她个人资源而存在的那个冗余网络，经过这一轮结算，缩减为“有资源者得之、无资源者失之”的偶然条件。

到这里，第一笔矛盾把照护卸出了生产组织，第二笔矛盾把代际分担从默认配置变为需要调动的偶发帮助。两轮结算之后，母亲身边已经空了两把椅子。而同时进行但尚未被结算的第三笔矛盾，正在把剩下的最后一把椅子——那个理论上可能分担的父亲——也从她身边锁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笔嵌套：住房商品化把祖辈从日常存在变成客人的那一刻，劳动力市场的“理想员工”文化正在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把父亲锁死在“无限可用”的岗位上。母亲不是先失去祖辈、再失去丈夫——她是同时被两股力从两侧收紧：左边的人被距离推开，右边的人被工时锁死。撒土的夹逼之所以凶猛，不是因为它分三步线性推进，而是因为这三步在时间上是叠加的、在结构上是相互锁定的。空间被从多个方向同时压缩，让人连一步都挪不开。

（三）第三笔矛盾：“理想员工”预设 vs. 照护责任的不可消除

第三笔矛盾发生在劳动力市场内部，但它引爆的时间与第二笔矛盾高度重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这笔矛盾的内在结构是：劳动力市场的主流组织逻辑要求劳动者——尤其是被隐含期待为主力军的人——“全职全时全心投入”，加班常态化、随时待命的隐性要求在很多行业中被默认为职业发展的前提；但照护责任——照顾一个幼小人类所需的时间与精力——在物理上不可消除、不可无限压缩、不可完全外包。当一名劳动者同时也是照护者时，这两套要求就发生了直接冲突。

如果这两套要求是平等地落在所有劳动者身上的矛盾，那么它可以被转化为“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谈判”问题。但在性别分工的文化惯性与制度安排下，这套矛盾被沿着性别脚本重新分配了：男性被锁定为“主要养家者”，他的超长工时被认为是“为家庭奋斗”，他对家庭的缺席被理解为“身不由己、没办法”；而女性被锁定为“主要照护者”——当她因育儿需求而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拒绝异地调动、或调整职业赛道时，她自动被劳动力市场的评价体系标定为“不够拼的人”。这不是某个雇主或丈夫的个人偏见，而是劳动力市场对“理想员工”的预设（不受照护责任干扰）与家庭内部性别分工的文化预设（照护是女人该兜底的事）之间形成的结构性咬合。

第三笔矛盾的结算结果是：照护责任并没有被两性平等分担，而是沿着一条早已刻好的性别路径，全部滑到了作为生育直接承担者的女性肩上。这一步结算之后，一个完整的夹逼结构就锁死了——单位把照护卸出了生产组织，住房商品化把祖辈从日常变成客人，劳动力市场把父亲锁死在“无限可用”的位置上，三个方向的力量同时收紧，最终把母亲逼入了独扛的处境。这不是任何人设计的，但它的效果就仿佛有人在暗中把所有退路都一扇接一扇地关上了。

（四）制度的补位滞后与撒土的定义浮现

在前面三笔矛盾的交替结算中，一条共同的线索贯穿始终：照护的兜底被一项一项地撤除，而每一个被撤空的位置，都没有公共制度及时搬一把椅子进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张不断铺下去的公共安全网——普遍可及的托育、能实质分担父亲育儿时间的制度设计、对母亲照护劳动的社会性承认——那么三笔矛盾不会必然地制造出今天这样大面积的退出判断。在那些早期经历了类似的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但同步建立了普遍主义公共照护体系的北欧经济体中，生育率并未出现同等程度的断崖式下跌，这一对照本身就暗示了补位的存在与否是关键变量。[3]

问题恰恰在于，中国在同时经历这三笔矛盾加压的几十年里，公共照护的制度供给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覆盖不均、价格高企的状态。零至三岁托育服务的市场化起步晚，且对于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近乎奢侈品；学前教育的公立学位供给在近几年有所提速，但仍远远未能覆盖全部需求；小学课后服务在“双减”政策之后才开

始被系统性地重视——而在此之前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下午三点半到六点之间那段无人接管的时间空白，是由无数的母亲以牺牲工作、收入、晋升前景为代价，日复一日地填补的。

补位滞后不是撤土本身，而是使撤土的后果无法被及时吸收的那层条件。撤土指的不是“制度没来”，而是“原有的兜底被撤掉了”——这两件事是分开的，但在母亲的经验中，它们是同一块地表：土被铲光了，也没有新的土壤进来。

至此，撤土的概念轮廓已经被三笔矛盾的结算过程和补位滞后的条件共同逼了出来。以下是本文给出正式定义的时刻：

撤土，指在特定历史-制度条件下，社会系统性地曾经由生产组织、亲属网络、邻里社区共同兜底承担的照护与再生产责任，逐项从母亲的日常存在中撤除，使原本分散在多个节点上的冗余兜底被一层一层地卸空，而在此过程中，公共照护的制度供给未能及时填补兜底撤空后留下的空白，使个体被迫裸露在被撤空了兜底的地表上，独自面对照护与再生产的全部成本与风险。

这个定义中的几个要素——冗余兜底、默认可用、嵌入日常、非契约性——不是事先摆好的坐标，而是刚刚在前面追溯三笔矛盾结算的过程中已经分别浮现出来的：第一笔矛盾结算撤掉的是嵌入生产组织内部的默认可用节点（单位托育）；第二笔矛盾结算撤掉的是嵌入日常生活的冗余亲属节点（代际共居中的祖母）；第三笔矛盾结算锁死的是本来有可能构成另一种冗余节点的父亲（父职被劳动力市场锁死）。三步撤光之后，母亲身边原本具有冗余性、默认性、非契约性的照护承担网络——那就是土——被从三个方向上同时铲平。

在对“土”的构成做了上述追溯之后，有必要做一次内部层次的区分，以便概念在使用中不至于过度延展。本文所说的“土”，由三个相互依存的层面构成：第一层是直接的、日常的照护承担者——祖辈、单位保育员、邻居、以及那些在生活世界中实际伸手分担的人。这是土的肉身。第二层是使这些承担者得以在日常中自然在场的制度条件——单位托育的空间邻近性、单位住房分配所提供的代际近居可能性、劳动力市场中对非无限可用者的容错空间。这是土的土壤环境。第三层是一种未成文但默认可用的相互接应义务感——不说破的、不基于契约的、在生活实践中被反复确认的一种期待：当你撑不住的时候，会有不止一只手伸过来。这是土的气候。撤土撤的，正是这三层的同时瓦解：肉身被抽走（单位托育关了、祖辈不住隔壁了）、土壤环境被铲平（住房商品化把近居拆散、劳动力市场把父职锁死）、气候变冷（相互接应的默契被“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所置换）。[4]

四、一抔土三代人：一个女性如何识出土的撤离

撤土在制度层面是可追溯的。但它要转化为年轻女性“做不了”的退出判断，还需要经过一个关键环节——感知。撤土不是以制度变革的形式直接呈现在个体意识中的，而是以日常经验的质感变化——“这件事越来越变成我一个人的事”——被逐步照见、确认、凝结为判断的。

本节不依赖概括性的类型叙述，而是引入一个跨越三代女性的具体案例[5]，来展示撤土的发生学逻辑在一个家庭内部如何被时间性地经验到。案例不是一个被抽出来供理论解剖的标本，而是理论得以“展示自己如何贴在经验上”的那个具体表面。

三代人的切身记忆

外婆李秀兰，生于一九五三年，东北某工业城市的纺织厂工人，一九八一年生下女儿。当时厂里有托儿所，就在车间后面，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二十分钟的哺乳假，年轻妈妈们到了时间就结伴去喂奶。托儿所条件不好，冬天暖气不足，但近。李秀兰的婆婆也住在厂区分配的平房里，走路五分钟，每天下午主动来接孩子，顺带把晚饭做了。李秀兰后来告诉女儿：“那些年肯定也有累得想哭的时候，但说不上来，总觉得周围有人在。你今天不舒服，隔壁张姐替你值半小时班；明天孩子发烧，托儿所的阿姨会帮你多照看一会儿，让你把活干完。不是谁特别伟大，就是那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母亲周敏，生于一九七八年，大学毕业后在某二线城市的出版社工作，二〇〇六年生下女儿。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但没有单位托儿所。周敏的产假结束后，婆婆从县城老家过来帮忙带孩子。但婆婆和她住不惯，婆媳

之间因育儿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摩擦日益加剧。一年后婆婆说要回去“歇一歇”，此后再来就是每次一两个月，像做客。周敏的丈夫是一家私企的项目经理，经常加班到晚上九点以后，出差一去就是半月。周敏发现，所有日常照护的缺口最后都堆到了她一个人身上：孩子生病是她请假，放学是她接，家长会是她参加。她曾向丈夫提过“你能不能少出点差”，丈夫的回答是：“我也想早点回来，但我能怎么办？项目就是这么排的，我不去谁去。”她后来告诉女儿：“妈当年不是不想好好带你，妈是没有多余的力了。有时候你半夜闹，妈抱着你在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觉得，这个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是负责让你活着的。你爸不是坏人，但他在另一套系统里锁着，锁得我也没话可说。”

女儿周穗，生于二〇〇二年，目前在某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她在大学期间就听到了很多同龄女性关于“生不生”的讨论，毕业后又在同事和朋友间反复看到同一种模式。她的一个闺蜜，二〇二四年生了孩子，丈夫在某大厂做算法，育儿假结束之后就回到了每周六天、每天十二个小时的工作节奏里。闺蜜有一次在深夜发帖说：“我已经连续三天只睡四个小时了。孩子肠绞痛、我乳腺炎、丈夫在加班。今天凌晨三点我抱着孩子在客厅走，走到窗户前面，我想如果我把窗户打开，风会不会把孩子吹得不哭了。然后我吓得立刻把窗户关了。我不是想伤害他，是在那一秒，我觉得我连抱稳他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周穗读了这篇帖子后，给母亲打了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周穗后来反复记起的话：“穗穗，你现在确实比我当年难。我当年身边起码还有你姥姥，虽然她后来跟我处不好，但她在的时候，至少我还能去上个厕所。你现在如果生了，你旁边有谁？”

周穗没有生孩子。她和母亲、外婆坐在一起聊过这件事。外婆说，我当年也没觉得轻松，但好像总有人在旁边，不是专门来帮，就是刚好在场。母亲说，我当年总觉得你爸该多帮点，但他也脱不开身，他那套班制比我那套还硬。周穗说，我们这茬人，也不是不想生，是不敢——我看得太清楚了，你们当年身边还有别人，我现在身边，算来算去，怎么算都只有我自己。我扛不住。

不是“怕”，是“清醒”：感知如何凝结为退出的判断

在这个三代人的对照中，撤土的发生学逻辑被具体地、时间性地展示了出来。外婆那一代，是在撤土发生之前或早期——她脚下的土虽然粗糙，但仍然具有冗余和默认的质地：单位托儿所就在车间后面，婆婆住在隔壁，同事之间有一层日常的相互接应。母亲那一代，处于撤土三步推进的中途：单位托儿所已经没了，婆婆从日常存在变成了被调动的“客人”，丈夫被锁在另一套劳动力市场逻辑里。她还有半片土——临时搭手的婆婆和偶尔在家的丈夫——但兜底已经没了。当她撑不住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身边没有一个能立刻接住她的人。女儿周穗这一代，面对的是撤土三步全部完成、且制度补位遥遥无期的整片坚硬地表。她外婆当年的厂区托儿所、走路能到的婆婆、隔壁可以替班半小时的张姐——在她这一代面前，全部消失了。她的同龄人正在用一篇篇帖子展示给她看：进入生育之后，你会被丢进一个怎样的处境。她把这些全部看在眼里，做出了判断——不是“怕”，是清醒。

年轻女性的这个判断不是对生育本身的否定，恰恰相反，她们中很多人正是因为太知道照护一个生命需要付出什么，才会判断出自己在那样的条件下做不到。她们的退出不是“想要的太少”，而是“这件事要求得太重，而我只长了两只手”——这不是意愿层面的不愿，而是存在条件层面的不能。

五、撤土的深层揭露：价值封存与从结构保障到个体偶然

撤土不仅制造了年轻女性当下的退出判断，还在更深层面上同步完成了一个隐蔽的意识形态操作：将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封存起来、不使其进入公共核算体系——同时将“生育是否美好、是否可能”从一种被结构保障的概率转变为高度依赖个体运气的偶然事件。

（一）照护价值的系统性封存

撤土完成的不仅是一项制度变动，它在完成这套动作的过程中，同步实施了一个后果深远的操作：将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封存起来，不使其进入公共核算体系。

在第一笔矛盾结算中，单位托育被关停，原先由企业雇用的保育员下岗了——企业账本上那笔照护成本被清零。但照护劳动的总量并未减少。孩子仍然需要被照护。这笔劳动被沉默地转移到了一群没有工资、不被计量、在GDP统计中等于零的人身上——母亲。

在第二笔矛盾结算中，代际照护从日常存在变成了需要调动的人际资源。祖母搬来带孙子，是替儿媳分担而不是替儿子分担——这在旧日父权家庭叙事的底层脚本中被表述为“帮忙”，而不是“劳动”。同样的，在第三笔矛盾的结算中，父亲“没办法”参与照护的叙事，将照护的全副重担压到了作为最终兜底者的母亲肩上。这一系列转移的结果是：照护劳动的社会总量从未减少过，但它从公共账本上被一笔接一笔地抹掉了。它变成了无价之劳——不是因为它珍贵得无法标价，而是因为它被刻意地排除在了定价系统之外。社会不承认它存在，却依赖它在每一天的深夜里都还在运行。

这个“价值封存”机制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再生产劳动批判的传统——如Silvia Federici对再生产劳动被剥夺的分析、Nancy Fraser关于照护的边界斗争的论述——之间存在实质上的亲和性。两者都看到了照护劳动在资本积累的外围被系统性低估的过程。但撒土的独立贡献在于指出了这种低估的另一个维度：照护劳动在公共账本上消失，不仅是因为它在资本核算中被定义为“非生产性”，还因为那些曾经使它可见的制度载体——单位托儿所的保育员岗位、在公共制度中被承认的集体照护——被一项一项从制度地形图上铲平了。马女框架解释了照护为什么不值钱；撒土补充解释了照护为什么变得看不见。这两笔追问是独立的，不能相互通约。[6]

（二）从结构保障到个体偶然

兜底撤退后，生育的“被接住”的可能性不再由结构来保障，而是高度依赖个体的偶然条件：一个女性是否拥有一个高度参与育儿、并且劳动力市场处境允许他参与的丈夫；是否拥有身体健康、意愿强烈且居住邻近的祖辈；是否有足够的经济收入购买高质量的托育服务。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被预设为“默认会存在”。它们的实现依赖个体运气，而不是社会的承诺。

运气是不均质的。它落在不同人身上时没有任何公正可言。这恰恰是“结构保障”与“个体偶然”之间那道质的裂隙：前者给每一个踏入生育的女性一个可预期的安全网底线；后者把生育变成了一场个人资质的残酷抽签。当一个女性清晰地判断出，生育在今天这片地表上是否还能有一点点“被接住”的体验，已经是高度偶然的事——不是因为她不好，而是因为结构不兜底——她再试图在这个结构中寻找那个可能成全她的概率，就是在做一次赌注。退出，从这个角度说，不是对生育的拒绝，而是对一场被撤空了兜底的赌局的拒绝。在这片地表上，生育这件事本身的质地已经变了：它不再是社会说“你生，我们一起帮你养”的共同事业，而是社会说“你生，你自己想办法”的私人自理。

六、潜在反驳与辩护理据

反驳一：“撒土”是否暗含了对旧日的整体美化？

一种反驳可能会指出：“撒土”作为一个从“有”到“无”的叙事概念，在修辞结构上本身就携带了一种怀旧的语调——即便作者反复声明不美化旧日，但读者听到“失去”时，容易被心理惯性牵着走向“失去的总是好的”。这不是攻击作者有没有声明“不美化”，而是攻击概念本身的修辞结构就自带了某种美化效应。

本文对此的回应是：这不构成概念自身的缺陷，而恰恰是它精确的地方。本文要命名的不是“现在不好”，而是“曾经有过的某种功能被撤除了”。要命名“失去”，就必须用失去的语言。不用失去的语言，就装不下代际对照中那种“母亲那一代还有、我这一代没了”的断裂感。本文严格区分两种完全不同层面的判断：一是整体性地断言一个时代“好”或“坏”——那是历史评价，本文不做，也不支持。二是精确地指出某个特定功能曾经存在、后来消失了——那是发生学识别，是本文的全部工作。如果有人因为听到了“失去”就以为听到了“复古”，那是那个人自己把两件事叠在了一起，不是概念的问题。概念不能因为被误读的概率而自我阉割其精确性。

反驳二：“土”本身也是一种父权制度，有何值得怀念？

第二种更尖锐的反驳来自性别研究的内部视角：旧日那些分担机制——邻里互助、大家庭共居——恰恰是父权制运行的具体时空载体。女性在其中被强制性地捆绑在照护者角色上，她们之间的互助往往是别无选择之下的相互承担，而非自由选择的团结。撤土撤走的不仅是兜底，也包括束缚。年轻女性在土撤之后要求的，不应是土的重植，而应是照护责任的彻底重新分配——将女性从照护者的预设角色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用新的公共兜底重新把她们钉回那个位置上。

这是本文在整个论证过程中遇到的最具挑战性的内部张力。本文的回应分三层。

第一层，承认“土”的父权质地。旧日的土确实长在父权的土壤里。它的兜底功能——有人搭把手、有地方托管孩子——与它的束缚功能——将女性钉在照护者位置上，将照护劳动自然化为“女人的事”——共享着一套制度安排。撤土没有区分这两层。它在撤走束缚的同时，也撤走了兜底。留下的不是解放，而是一种困境：现在没有人逼你必须生了，但你一旦选择生，也找不到任何帮手了。这不是“自由”，这是被从强制捆绑的位置扔到了无人接应的荒原上。

第二层，指出这重张力本身恰恰暴露了再植土必须守住的核心原则：新的土，必须与旧日的父权土在制度预设上不可通约。旧日的兜底之所以长满父权杂草，根本原因在于它的整个运行逻辑建立在一条隐含的不对等预设之上——照护是女人的事，其他分担者只是在“帮忙分担女人的事”，而不是各自承担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理应承担的那一份。再植土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从根部打掉这条脚本。这不是靠号召“男性多参与”就能解决的道德规劝问题，而是要把照护重新定义为一项社会的公共责任，不以任何特定性别为预设承担者。以育儿假的非转让性设置为例：如果一部分育儿假被设为“父亲不休就作废、不能转给母亲”，那么这条制度的运作就不依赖家庭成员之间的善意协商。它不预设“谁更擅长带娃”，它只规定谁必须参与。它在把父亲从“无限可用”的劳动力期待中松绑的同时，也把母亲从“最终兜底者”的预设中释放出来。这就是新型公共兜底与旧日父权兜底之间那道不可重合的制度差异点。

第三层，正面回应反驳者追到最深的那一问：如果旧日的兜底功能与父权束缚在制度上是同构的——比如，正因为它嵌在父系的代际共居里，照护才是“默认可用”的——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把“兜底”从“父权”中在理论上拆出来单独“再植”？本文的回答是：不能完全拆开，但必须坚决地拆。拆不开的部分是经验层面的：历史上，那些制度安排的兜底面和束缚面确实是同一块布的正反两面，无法泾渭分明地分离。拆得开的是规范层面的：兜底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并不逻辑必然地需要父权作为唯一的制度载体。人类完全可以在承认照护是公共责任、不将女性预设为天然照护者的前提下，设计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兜底安排——它同样冗余、默认可用、嵌入日常，但不再长在父权的根上。北欧经验中非转让性父亲育儿假的制度化、公共服务的普遍主义逻辑，都已经为这种拆解提供了局部的实证可能。[7] 反驳者的追问没有摧毁再植土的可能性，它只是精确地划定了再植土的规范性底线：不能复辟父权。这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声明，而是一项制度设计的硬边界——越过这条线，再植土就是在复辟压迫；守住这条线，它才是在重建正义。

反驳三：为什么经济最困难的女性没有更显著地退出？

在既往的实证研究中，确实观察到在许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生育率并未出现与撤土程度等比例的断崖式下滑。这是否意味着撤土并非导致退出的原因？

本文对此的回应聚焦于一个发生学事实：退出本身是有门槛的。撤土是一套结构性条件的变化，但将这些条件“转化”为退出判断并贯彻为实际行为，需要两个在阶层维度上不平等分布的条件。其一，感知撤土发生的认知通道——信息的获取、代际对照的可比性、同辈叙述的曝露程度——在数字鸿沟和社会网络中是不均匀分布的。其二，更要紧的是，退出之后有替代性生命路径可走的社会条件。一个没有高学历、从事不稳定工作的女性，她的生存路径在结构上被牢牢地框在婚姻与母职这条线上，生育对她而言不是“可选项”，而是生存结构中的默认配置。她也承受着撤土的全部后果——甚至更重。她脚下的土被撤得比谁都彻底：她的雇主不提供任何托育便利，她的母亲可能同样在从事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动、早已累得没有余裕提供日常照护，她住的出租屋里没有可以托付孩子的邻居。但因为退出之后没有别的社会身份和物质条件可以承接她、让她还能活下去，所以她的退出不是在行为上“不生育”，而是沉默地承受着一场没有退路的独扛——她连说“我不扛”的资格都没有。这部分女性不是撤土概念的证伪证据，而是撤土最沉默的受害者。认出她们被遗留在那一小片残

存的父权碎片——丈夫的工资、长辈对传宗接代的执念所带来的微薄补贴——上的处境，远比把她们简单地归为“高生育率群体”更接近发生学应有的追问方向。

七、再植土：出路不在于呼唤“责任”而在于重建公共兜底

对撤土的发生学追溯，很自然地被追问：出路在哪？本文对这个追问的回答不提供政策清单，而是指明方向性的道路转向：再植土。让被撤走的兜底，以不再长满父权杂草的方式，重新回来。[8]

再植土不是对旧日土壤的复制，而是在新原则下重建公共兜底。它的核心方向有三条，每一条都对应着撤土所暴露的一个核心困境。

第一条，让照护劳动重新进入公共核算体系。全职育儿的时间在社保积累和职业资历中被承认；照护劳动的贡献在税收、养老金、医疗保障等制度设计中获得与市场劳动对等的可见性与回报。这不是对母亲的特殊优待，而是一笔在撤土过程中被悄悄抹去的账的重新记账。一笔劳动，它参与了社会再生产、供养了下一代劳动力，它在公共账本上不该等于零。再植土的第一铲土，就是把被抹掉的账重新翻开。

第二条，重建公共照护为一项社会基础设施。零至三岁托育、课后服务及儿童医疗，不应被视作“帮助家庭分担”的福利恩惠，而应被认定为一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公用事业。一个社会的集体判断在此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愿意为供电的一秒中断投入巨额保障，却默认孩子下午三点半之后那三小时的时间空白应该由母亲一代接一代地默默填上。这不是疏忽，而是一种深埋的偏见——照护没有被承认为基建，它的断裂不算“事故”。再植土的第二铲，就是把照护写进基础设施的清单，让它的崩溃也能被公共语言描述为“故障”，而不只是“女人的难处”。

第三条，把“父亲”从劳动力市场对无限可用性的期待中释放出来。育儿假的不可转让部分、灵活工时的去污名化、对“照护能力”作为完整劳动者素质的承认——这些不只是对母亲的减负，也是对父亲的松绑。当前劳动力市场把一名“理想员工”定义为随时可被召唤、无任何照护负担的人。这套定义伤害的不仅是被它标记为“不可靠”的母亲，也包括被它锁在“养家者”角色、被剥夺了日常亲密参与的父亲。再植土的第三铲不只是在帮母亲卸重，也是在把父亲从另一套枷锁里放出来：他也可以是一个有照护能力的、完整的人，而不只是一台会挣钱的机器。

这三条方向的关键，不在于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在于让照护不再是个体的私事。撤土之所以能从三面夹逼地把母亲逼入独扛——正是因为每一轮矛盾的结算都把照护往私人领域推了一步，都把“你一个人扛”在制度上坐实了一分。再植土的反向运动，就是在每一步追回来：重新把照护写回公共账本，重新把照护定性为基础设施，重新把被锁死的人从两套旧脚本中同时解放出来。这三位一体，就是兜底的重建。

至于那些已经被撤土彻底改变了判断的年轻女性，她们会不会因为再植土而“回心转意”？本文不下这个判断。本文坚持它的边界：退出是她们在土被撤尽之后做出的理性判断。如果土重新被填回来，她们当然会重新判断。但再植土的首要目的不是在短期内提高生育率——那是在把女性当作一种需要被优化的生产力指标。再植土的首要目的，是让任何选择了生育的人——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的母亲——不再被遗留在那块什么都没有的地表上。这件事值得做，不是因为后果是统计数字的回升，而是因为撤土的发生学追溯已经指认了这个处境中具体的不正义究竟是什么：一个社会的照护负担被系统性地逐项卸除、全部压回到个体肩上，而那个社会在卸除的过程中把照护劳动从公共账本上抹去、拒绝对其进行任何制度性承认，然后又对被压在底下的那个人说“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负责”。这就是撤土暴露的不正义——不是社会不够慷慨，而是社会推卸了自己的一份，还把这一份悄悄地记成了零，最终让那个被所有人依赖着、却不被任何人接住的个体来扛全部的重。再植土的伦理底基，不是情怀，不是恩惠，是对这一笔被抹掉的账的重新承认。

八、结语：兜底的消失与赌注的收回

本文提出的核心判断可以收束为一段话：

当代年轻女性在生育面前的集体性退出，是在制度层面可追溯的撤土过程——经由三笔矛盾的交替结算与相互锁定，社会系统性地撤除了照护与再生产的多重兜底节点，将全部成本与风险压回到个体女性肩上，而公共补位又迟迟未能及时填进那片空白——被代际对照与同辈叙述转化为肉身感知之后，做出的清醒退出判断。生育从一项被社会整体兜底的共同事业，蜕变为一个被个体独自承受的私人风险。退出不是怕，是诚实判断出自己被遗留在了一片什么都没有的地上；不再下注，不是赌不起，而是这场赌局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承诺给参与者的基本公正——那个承诺是，你走下去，会有不止一双手伸过来。

回应的方向是再植土：让照护劳动重新进入公共账本，让公共照护被认定为社会基础设施，让父亲能够从“无限可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期中松绑——并且在每一步制度设计里死死守住那条底线：眼前的这块新土，不能复辟旧日父权地把女性预设为照护的唯一受体。再植土不是怀旧，不是回去，是在被铲平的地表上，按照公义的原则重新填土——这件事极其艰难，但它是一个社会面对下一代人时，最底限的诚实。

本文的判断有其证伪条件。如果在未来某个时候，照护劳动获得了充分的公共承认，公共托育与课后服务成为普遍普及的基建项目，劳动力市场对母职与父职的结构性锁定根本上有了显著改变，且父亲非转让育儿假等制度大规模落地——而在这些前提被充分实现之后，大量年轻女性依然选择退出，且她们的理由不再是“得不到分担”“独自扛不住”，而是基础条件具备之后“这件事本身对我没有吸引力”，那么本文的核心判断就需要修正。那将意味着撤土并非退出的唯一心动因。但在撤土未被反转、补位尚未完成之前，退出始终是一笔诚实的选择：不是不想要，而是没有土。

注释

[1]: 本文使用的“土”是比喻性的理论构造，指涉社会生活中那些嵌入日常、冗余兜底、默认可用的照护与再生产承担网络。它与“社会支持”“非正式网络”等术语的关键区别，在于强调其“结构性兜底”属性及可被系统性撤除的历史过程性。第三节将在矛盾结算的追溯过程中自然展示这四个属性的具体内涵，在此不预先展开。

[2]: 本节所引单位托育关停的案例，系基于公开档案资料与既往访谈记录的合成与匿名化处理，用以例示理论概念，并非经过系统抽样的经验数据。文中涉及的具体厂名、人名及相关细节均已改写，以保护隐私并服务于概念建构。

[3]: 此处所称“北欧经验”，是对部分北欧国家政策特征的类型化概括，用作制度补位逻辑的参照说明。本文不预设这些经验可直接移植至其他社会，也不对其整体性别秩序做出全面评价；仅取其公共托育与非转让性父亲假等制度要素作为“再植土”可能形态的局部例证。

[4]: 这一层次区分是对审稿意见B6的回应。在原稿中，“土”时而指制度安排（单位托育）、时而指非正式网络（祖母的日常照护）、时而指劳动力市场文化（对父职的容错空间），概念边界有过度延展的风险。增加层次区分，旨在让照护承担者（肉身）、制度条件（土壤环境）、文化氛围（气候）各归其位，同时保持三者在发生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

[5]: 本节案例系基于真实社会经验与既往口述史材料进行的合成与匿名化建构，人物均为化名，用以展示理论概念如何在个体时间经验中被感知，并非作为经验证据使用。该案例不替代系统性的经验研究，其功能是概念的展示锚点。

[6]: 此处增加了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批判的对话。这一补充不改变原稿中“照护价值封存”的实质判断，而是精确判定了撤土与马女框架之间的亲和性与不可通约性。原稿在展开这一维度时没有显示对“这个分析本身可能被还原为马女框架的应用”的警觉，此处补上了这一笔方法论自陈。

[7]: 同注释[3]。

[8]: 本文对“再植土”的探讨限于方向性与原则性层面，不构成具体政策清单或可行性方案。其目标在于标明实践转向的应循方向，而非替代后续的制度设计、成本测算与社会评估。

参考文献

- Budig, M. J., & England, P. (2001).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2), 204–225.
- Correll, S. J., Benard, S., & Paik, I. (2007). Getting a Job: 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5), 1297–1338.
- Du, F., & Dong, X. (2013). Women’ s Employment and Child 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62(1), 131–155.
- Fraser, N. (2016).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nd Care. *New Left Review*, 100, 99–117.
- Federici, S.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utonomedia.
- Thévenon, O., & Gauthier, A. H. (2011). Family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 ‘Fertility-Booster’ with Side-Effects. *Community, Work & Family*, 14(2), 197–216.
- Peng, I. (2011).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Confus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are Expansion in South Kore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2(4), 905–923.
- Yamashita, J., & Soma, N. (2021). The Double Burden of Care in East Asia: Emerging Welfare States and the Re-Familialisation of Childcar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55(7), 1270–1284.